

土耳其入盟前景中的“宗教因素”（钮松）

土耳其的入盟道路历经数十年，其前景仍不明朗，对于其入盟受阻之因多有揣测。随着冷战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复兴，“9·11”为标志的伊斯兰极端主义暴力活动的兴起，人们越发将西方与伊斯兰世界间业已存在的问题归结为宗教问题，这也波及对土耳其入盟历程的认识。但事实并非如此简单。

欧洲历史上的宗教改革一举冲破教权对于欧洲长期的政治束缚以及僵化神学思想对人们思想的禁锢：首先，宗教上，新教国家乃至日后天主教国家都实现了教权与政权的脱钩，“欧洲”逐渐从基督教的宗教欧洲向有基督教背景的文明文化欧洲转变，这种文明文化欧洲在今日便是拥有民主自由价值观念国家聚合之欧洲；其次，神学思想上，回归个人信仰与自由的基督教思想转而演进为一种探索、进取、公益、慈善和重视科学的精神，这促进了欧洲从人文社会科学到自然科学的繁荣和发展，也为1500年左右以来欧洲开创的西方全球时代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从“地理欧洲”到“宗教欧洲”，再到“文明文化欧洲”，欧洲从非宗教化转而宗教化，进而实现了去宗教化。入盟的“哥本哈根标准”并未提及任何宗教属性或文化属性的标准，既然如此，那么从逻辑上看欧盟成员国并无特定之宗教属性或者文化属性的要求。既然欧盟回避自身建设过程之中的宗教文明属性问题，因此欧盟并无专门文件探讨其宗教政策，但它在一些文件中具体阐述了其宗教政策和文明交流、对话的政策。土耳其共和国实现了高强度的政教分离，其早期存在着激进的欧洲化与世俗化政策，但土耳其共和国的宗教政策遵循的一条主线是：一方面，保护信众对于伊斯兰教和其他宗教的个人信仰；另一方面，绝对不允许宗教势力以任何形式的宗教团体或者政治团体参与政治或干涉政治。

从对欧洲和土耳其共和国的属性分析到对欧盟和土耳其的宗教政策考察，不难发现，笼统言及宗教因素对土耳其入盟前景的影响是不精确的。严格来讲，这种宗教因素的影响至少包含了两个层面的意思：即土耳其共和国与欧盟是否在去宗教化与世俗化的属性上有一致性；土耳其共和国的宗教政策是否符合欧盟对成员国的相关要求。事实上，在以上这两个层面，所谓宗教因素中除了土耳其对于温和的宗教政党参与政治有限制甚至打压对其入盟有着明确的负面影响之外，其余方面均不构成对其入盟的负面影响，甚至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其伊斯兰教文明文化属性只在一定程度上对引起欧盟国家的排斥，但不构成决定性因素。人们对于所谓宗教问题的过分关注而忽略了欧盟本身只是一个政治和经济组织，将观察土耳其入盟进程的视野从所谓宗教问题转向经济问题十分重要。坚守世俗化和发展市场经济构成了土耳其加入欧盟的两大动力。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欧盟研究中心 钮松 副研究员）